

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下的左翼 女性身影：論陳映真與藍博洲的 白色恐怖系列作品*

李淑君**

【提要】

本文聚焦探討陳映真的〈山路〉、〈趙南棟〉、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臺灣好女人》、《藤纏樹》、《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共六部文本作品，探究社會主義思想的蔡千惠、葉春美、宋蓉萱、許月里、蔣碧玉、許金玉、傅雙妹等人的形象與政治意義。陳映真與藍博洲的史觀軸線皆是「反日民族解放運動」到統一的民族解放左翼路線，兩人所塑造的社會主義理念的女性，呈現了男性作家對於左翼革命理想女性的想像與期待。兩人筆下的左翼女性成為母性、妻職、被啟蒙、再生產勞動、關係性角色、階級優先於女性。本文認為階級與民族的宏大敘述使得女性以「一場不快樂的婚姻」作為理念的實踐；其次，女性主體融入到階級議題中，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女性、威權、與轉型正義：從白色恐怖女性記憶與敘述論轉型正義的性別視角」之部分成果（計劃編號 106-2410-H-037-014-MY2），初稿曾發表於「2019 年文化研究年會」，在此感謝科技部計劃之支持與年會的討論建議。特別致謝兩位論文匿名審查人之審查建議，協助本文在修改過程更臻完善。此外，本文關於「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及「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的思考，為中山大學萬毓澤教授「馬克思主義與民主理論」一課堂所提供的視野，在此一併致謝。最後，感謝高師大博士陳麒文於擔任助理期間協助資料蒐集、格式校對等工作。

**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成為階級優先於女性的政治格局；其三，左翼女性典型成為政治上的被啟蒙者、替代性的贖罪者；其四，母性精神成為社會主義與革命理念的延續，母親身分神聖化革命。本文在民族解放、社會主義、女性主體三者「不快樂的婚姻」中，探究左翼男性作家筆下的左翼女性。

關鍵詞：陳映真 藍博洲 白色恐怖 左翼女性

一、前言

本文並置具有中國民族解放左翼立場的陳映真、藍博洲兩位男作家，探討兩人所書寫的白色恐怖系列中的左翼女性的被啓蒙、替代性贖罪、關係性角色、左翼女性系譜、再生產實踐、以及階級優先於女性等面向。本文將藍博洲與陳映真並置討論有幾點原因：首先，兩人皆塑造白色恐怖左翼女性的典範。其次，藍博洲在輔仁大學擔任「草原文學社」社長期間，便透過楊逵、陳映真而接觸到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¹ 奠基了其白色恐怖書寫的緣由。其三，藍博洲 1987 年參與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展開報告文學的寫作。其四，從書寫作品到政治立場上都看到藍博洲受到陳映真影響極深，如藍博洲書寫《藤纏樹》的傅雙妹時，自述傅雙妹一角是參照陳映真〈山路〉的蔡千惠一典型而創造出來。其五，陳映真與藍博洲為具有中國國族主義立場的左翼男性作家，陳映真在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中的序言〈美國的帝國主義和臺灣反共撲殺運動〉² 一文，肯認藍博洲「以中國的民族解放」的社會主義者作為書寫立場，前行研究阮桃園亦將陳映真、藍博洲並置定位為左翼作家。³ 可見陳映真與藍博洲書寫與理念上有共鳴之處。

陳映真書寫白色恐怖左翼政治議題的作品包含〈山路〉、⁴ 〈鈴璫花〉、⁵ 〈趙南棟〉、⁶ 〈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劇本《春祭》、

¹ 王文仁，〈從〈幌馬車之歌〉看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創作——兼論臺灣報導文學的幾個文類問題〉，《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 3 期（2005 年 6 月），頁 163-182。

² 陳映真，〈美國帝國主義和臺灣反共撲殺運動〉，收入《幌馬車之歌》（臺北：時報文化，2004 年 10 月），頁 14-20。

³ 阮桃園，〈真相的顯與隱——論藍博洲二部有關作家和醫生的報導文學〉，《東海中文學報》第 18 期（2006 年 7 月），頁 239-257。

⁴ 〈山路〉陳映真 1983 年 7 月 14 日作。陳映真，〈山路〉，《文季》（雙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83 年 8 月）。收入《陳映真作品集 5》（臺北：人間，1988）。又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5》（臺北：洪範，2001）。

⁵ 〈鈴璫花〉陳映真 1983 年 3 月 20 日作。陳映真，〈鈴璫花〉，《文季》（雙月刊）第 1 卷第 1 期（1983 年 4 月）。收入《陳映真作品集 5》（臺北：人間，1988）。又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5》

⁷〈夜霧〉、散文〈後街〉。藍博洲則有《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藤纏樹》、《幌馬車之歌》、《老紅帽》、《紅色客家庄》、《紅色客家人》、《臺共黨人的悲歌》、《臺灣好女人》與《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等作品。本文聚焦探討歷經白色恐怖的左翼女性角色，因此以陳映真的〈山路〉與〈趙南棟〉、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臺灣好女人》、《藤纏樹》、《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共六部文本作品，探究社會主義思想的蔡千惠、葉春美、宋蓉萱、許月里、蔣碧玉、許金玉、傅雙妹等人的形象與政治意義。陳映真與藍博洲的史觀軸線皆從「反日民族解放運動」到統一的民族解放左翼路線，兩人所塑造的社會主義理念的女性，呈現了男性作家對於左翼革命理想女性的想像與期待。本文並置探討陳映真與藍博洲的作品間的互文性，雖然兩人創作文類橫跨小說、報導文學等文類的差異，然而藍博洲書寫林明華與傅雙妹的事蹟時，苦無傅雙妹的資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藍博洲以陳映真《山路》的蔡千惠以及自己《幌馬車之歌》中的蔣碧玉為原型塑造了傅雙妹（小說中改名為徐郁妹）。可見即使藍博洲雖根據史料與田野進行創作，但其中敘述模式、敘述修辭、人物塑造皆透過藍博洲之筆重新塑造出來，具有創作者的創作性、史觀與視野。其次，本文關注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因此參照兩人作品的互文性與對話性，藉此以跨文類的方式進行主題式的討論。

關於左翼女性的論述，柯惠鈴從左派婦女回憶錄探討左翼女性獨立的主體經常「走了一段追求獨立的解放過程，最後的結局是個體淹沒在集體中」，追求解放的女性有著在性別與階級更多難以兼顧的兩

（臺北：洪範，2001）。

⁶ 陳映真，〈趙南棟〉，《人間》第20期（1987年6月）。又收入《中國時報》1987年6月，人間副刊，節錄為〈趙爾平〉。收入《陳映真作品集5》（臺北：人間，1988）。又收入《陳映真小說集5》（臺北：洪範，2001）。

⁷ 陳映真，〈春祭〉（《春祭》為1994年3月12日在國立藝術教育館公演之報告劇），《聯合報》1994年3月14日至3月15日，副刊。陳映真，《春祭》（現代戲劇集·演出劇本系列9），（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5）。

難局面，其結果變成「只存在黨性、喪失女性」的結局。⁸ 柯惠鈴的研究點出左派女性傳記中，女性往往陷入兩難的局面，結果往往成爲階級解放的主體，卻不見女性解放的主體。那麼陳映真與藍博洲筆下具有社會主義理念的左翼女性是否也是「只存黨性、喪失女性」呢？其女性書寫是否成爲左翼理念的象徵而弱化女性主體呢？臺灣左翼女性實踐者最廣爲熟知的包含臺灣共產黨的領導人謝雪紅、農民組合的葉陶、1950年白色恐怖時期因「計梅真等叛亂等罪一案」而被捕判刑的計梅真、錢靜芝、許金玉等人，以及加入司機工會的張金爵等人。臺灣具有左翼革命思維的女性，目前除了謝雪紅有較多相關研究與口述保留之外，左翼女性系譜甚少有相關書寫與紀錄。在左翼女性的書寫如此匱乏的情況下，藍博洲與陳映真兩人白色恐怖作品有意爲左翼女性留下紀錄與塑造，左翼女性身影便很值得閱讀與探究。本文在此關懷下，探究具有社會主義關懷的陳映真與藍博洲，筆下的蔡千惠、葉春美、宋蓉萱、許金玉、許月里、蔣碧玉、許金玉、傅雙妹等角色如何被塑造？在書寫中又產生什麼性別主體、民族解放與階級革命的矛盾？其書寫的女性是否民族革命與階級解放優先於女性主體？左翼女性的階級性、革命性、女性、母性之間如何辯證？左翼女性究竟是覺醒主體或是被啓蒙客體？上述問題爲本文探討之核心。

二、文獻回顧

目前探討陳映真與藍博洲的前行研究已有不少豐富、深入、眾聲喧嘩的討論。首先，吳懷晨、陳明成皆提及陳映真作品的「救贖」性格。⁹ 陳正芳、曾靜淪、趙剛則以第三世界書寫定位陳映真的左翼系

⁸ 柯惠鈴，〈軼事與敘事：左派婦女回憶錄中的革命展演與生活流動（1920s-1950s）〉，《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5期（2007年12月），頁141-162。

⁹ 參考吳懷晨，〈快樂的罪行：陳映真救贖三部曲結構中的罪與聖〉，《中外文學》第41卷第1期（2012年3月），頁87-135。陳明成，〈陳映真現象：關於陳映真的家族書寫及其國族認同〉（臺北：前衛，2013）。

統。¹⁰ 然而，從女性主體視角來探討陳映真作品的前行研究不多，主要有周芬伶、楊翠等人進行討論。其中，周芬伶從《忠孝公園》探討女性缺位的問題，指出女性多是男性的慰藉者、苦難的母親、親情的依附者。雖然其論述肯認〈山路〉中的蔡千惠是鮮活的女性角色，但呈現的是女性的沉默、空白與缺席，為大歷史敘述的書寫模式。¹¹ 楊翠在〈獻祭的聖杯——陳映真小說中的女性救贖意象〉一文，亦指出陳映真小說中的女性，普遍有著「母性的、救贖者的意象」，以批判陳映真在〈山路〉「『大地之母』的救贖，更是完全取消女性、取消女體的」。¹² 另外，歐崇敬雖然指出〈山路〉中的蔡千惠是透過不斷的勞動與悲苦，洗滌父母親以及二哥背叛同伴的罪惡，認為蔡千惠為白色恐怖受難者贖罪具有「社會主義式奉獻精神的女子的情懷」，且以母性光輝為基礎來教育李國坤之弟李國木，¹³ 卻未批判此種奉獻精神與父權文化的關係，缺乏女性主體的批判視角。本文基於女性主體的視角，希冀探討此種「犧牲」與「奉獻」恰好吻合父權體制要求女性「犧牲」與「奉獻」的性別框架。如〈山路〉中的蔡千惠透過在私領域「家庭」的自我奉獻與犧牲，來達到對於民族解放社會主義信仰的延續，並將女性置放在私領域與關係性的角色來實踐民族解放與社會主義理念。〈趙南棟〉中的葉春美則是實踐母職、展現母性得以傳承已逝去的政治受難者意志。陳映真對於左翼女性的書寫，是奠基在女性／私領域／照顧工作／母親此一性別框架當中。因

¹⁰ 參考曾靜渝，〈第三世界文學的實踐者——重讀陳映真八〇年代的文學創作與生產〉，《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 11 期（2010 年 9 月），頁 37-56。陳正芳，〈文化交流下的歷史印記：論陳映真和黃春明小說中的美國人〉，《臺灣文學學報》第 21 期（2012 年 12 月），頁 137-170。趙剛，〈重建左翼：重見魯迅、重見陳映真〉，《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7 期（2010 年 3 月），頁 277-289。

¹¹ 周芬伶，〈迷失《忠孝公園》——陳映真近期小說的女性缺位〉，《臺灣文學學報》第 5 期（2004 年 6 月），頁 133-151。

¹² 楊翠，〈獻祭的聖杯——陳映真小說中的女性救贖意象〉，收入《陳映真創作 5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9 年 12 月），頁 107-133。

¹³ 歐崇敬，〈「異鄉的存在」與「物化之虛無」的〈山路〉左翼政治思想〉，《思與言》第 45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23-56。

此，從性別視角來批判陳映真筆下左翼女性的「犧牲」與「奉獻」精神時，可以看見歐崇敬的研究高度推崇蔡千惠所象徵的社會主義理念精神，但當蔡千惠以贖罪的精神前往李國坤家中照顧李國坤之父母與年幼的弟弟，此種私領域的照顧精神卻成爲社會主義之贖罪精神，事實上是忽略父權體制中性別框架與剝削的問題。

藍博洲的書寫中可看出對於陳映真之繼承，如《藤纏樹》中的傅雙妹形象便是承襲自〈山路〉中的蔡千惠。范宜如指出藍博洲《藤纏樹》以陳映真〈山路〉的蔡千惠爲典型來塑造傅雙妹，讚揚藍博洲所塑造的傅雙妹不只是沉默的倖存者，而是那個時代女性在革命事業上的「進步」角色。¹⁴ 然而，本文追問傅雙妹真的被塑造爲「進步」角色嗎？其「進步」的內涵爲何？後文將一併討論。目前從性別視角批判藍博洲的論述則有趙彥寧〈階級與自然主義的美學：評藍博洲的《臺灣好女人》與江文瑜的《山地門之女》〉一短文，文中指出《臺灣好女人》中的女性書寫是一種「附帶」的書寫，認爲書寫緣起是基於對某位政治男性的○○才開始關注這些進步女性，如「高草之於石聰與蕭道應，許月里之於周合源，蔣碧玉之於蔣渭水和鍾和鳴」，接著趙彥寧認爲「在左翼『進步』的民族國家論述中，『進步』女性的生命經驗必須置於無產階級的革命號召下方有意義。」¹⁵ 趙彥寧針對性別—國家—階級—種族的關係質疑難道沒有其他的可能嗎？趙彥寧的短論可以呼應男作家筆下的左翼女性「只存黨性、喪失女性」的盲點，但趙彥寧僅以一小段書評討論《臺灣好女人》甚爲可惜。

針對陳映真與藍博洲的討論多扣緊國族意識型態、中國國族主義等視角，本文則以女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與國族主義的批判視角重新閱讀兩位男性作家，因此具有女性主體與性別關懷的前行研究爲本文

¹⁴ 范宜如，〈邊緣發聲：藍博洲《藤纏樹》的書寫策略及其意涵〉，《人文集刊》第5期（2007年7月），頁141-159。

¹⁵ 趙彥寧，〈階級與自然主義的美學：評藍博洲的《臺灣好女人》與江文瑜的《山地門之女》〉，《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第61期（2001年12月），頁29-32。

的重要參考。本文在此研究基礎，再深化陳映真與藍博洲筆下的左翼女性的內涵，指出兩人筆下的左翼女性正具現了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國族主義與女性主義之間的爭論。其中女性成爲被啓蒙者、替代者、再生產的照顧者，呈現了女性議題被隱藏到階級與民族解放當中，使得當性別「融入」於階級／民族卻成爲性別「融化」於階級／民族，亦看出其筆下是將左翼女性固著在性別框架中展現其理念。

本文以女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與國族主義的批判，併行來思考陳映真、藍博洲筆下的左翼女性，聚焦在〈山路〉與〈趙南棟〉兩篇文本中的具社會主義思想的女性蔡千惠、葉春美、宋蓉萱；藍博洲《臺灣好女人》、《藤纏樹》、《幌馬車之歌》、《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中的許月里、蔣碧玉、許金玉、傅雙妹等人進行討論。現有針對〈山路〉與〈趙南棟〉中的左翼女性研究依然不脫其理想典型與堅韌母性。¹⁶ 針對藍博洲的討論則提出書中女性在革命事業上的「進步」角色。¹⁷ 上述論點忽略具有社會主義理念的理想女性，以堅韌母性、政治被啓蒙者、替代性的贖罪者塑造時，將女性主體遮蔽於社會主義或民族解放理念；且是在父權體制的性別框架下展現理念。本文從女性主義對社會主義與國族主義批判切入，探究以民族解放／社會主義思想作爲寫作核心的陳映真、藍博洲筆下的左翼女性如何承載陳映真的社會主義理念，探討左翼女性所呈現的形象以及其中所呈現的女性與馬克思主義、民族革命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三、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民族解放的辯證

性別、階級、民族三者的關係應交錯辯證討論，然而，當階級與民族作爲宏大敘述時，經常出現幾個層次的盲點，首先，誤認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可以解決性別壓迫；其次，將階級革命與民族解放視爲

¹⁶ 曾靜渝，〈第三世界文學的實踐者——重讀陳映真八〇年代的文學創作與生產〉，頁 37-56。

¹⁷ 范宜如，〈邊緣發聲：藍博洲《藤纏樹》的書寫策略及其意涵〉，頁 141-159。

優先於性別解放的議題；其三，家庭的分析被獨立於階級與民族的討論之外。

女性主義者對「階級」作為宏大敘述的批判甚多。如瑪格麗特·本斯頓（Margaret Benston）、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潔格（Jagger）、楊（Iris Young）等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反思、繼承與衝突，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有幾個切入點：首先，女性再生產的角色與壓迫關係被忽略；其次，從女性主體視角思考生產、家務勞動、身體的「異化」概念；其三，批判性別壓迫被化約為階級壓迫；其四，批判「女性」被視為一種階級來思考。

首先，指出女性再生產的角色與壓迫關係被忽略的包含瑪格麗特·本斯頓、海蒂·哈特曼、潔格、楊都批判了馬克思主義中輕忽私領域與再生產（reproduction）活動。¹⁸ 瑪格麗特·本斯頓指出家務成為女人的責任時，即使女性出外工作也必須兼顧工作和家務，因此認為社會主義思想必須將對不正義批判回歸到私領域家庭當中。¹⁹ 海蒂·哈特曼在〈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不快樂的婚姻：導向更進步的結合〉一文將馬克思與女性主義的「聯姻」比喻為一場不快樂的婚姻，批判資本主義與父權制度是以夥伴關係存在的，女性的再生產工作亦生產了資本主義社會所需要的勞動力，若忽視父權制度的問題，那麼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的結合為一時，而此「唯一」就是馬克思主義。²⁰ 其次，從女性主體視角思考異化的概念則指出女性在身體、母職上產生異化與疏離，女性的生產、身體與母職實踐無法由自己決定，而是由他人決定即為女性的異化經驗；²¹ 其三，女性議題被化約為階級議題，以階級觀點來理解女性的壓迫，此盲點在於無法解釋

¹⁸ 黃淑玲，〈烏托邦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收入《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文化，2000），頁 55。

¹⁹ 轉引自羅斯瑪麗·派特南·童（Rosemarie Putnam Tong）著，艾曉明譯，《女性主義思潮導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²⁰ 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著，范情譯，〈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不快樂的婚姻：導向更進步的結合〉，收入《女性主義經典》（臺北：女書文化，2001），頁 323-338。

²¹ Alison M. Jagge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otowa, NJ: Rowman & Allanheld, 1983).

女性的壓迫處境。楊在海蒂·哈特曼的基礎上，提出馬克思主義應該轉型。認為階級是具有性別盲（gender-blind），因為無法對女性的壓迫進行充分解釋，才能超越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那一場「不快樂的婚姻」。²²

同樣的，民族解放作為宏大革命敘述時，其辯證可以分為幾個層次。首先，誤將國族議題優先於性別議題，將女性解放經常置放在國族解放的論述下，認為女性解放的最終前提是為了國族解放或國族解放會解決女性解放的議題。此脈絡下，女性往往被視為國族傳統象徵的承載體、附帶的議題。²³ 杜贊奇（Presenjit Duara）亦指出亞洲被殖民女性會被要求成為東方傳統的典範。²⁴ 在國族現代化的過程，女性經常被論述為一個需要被改造的集體，另一方面又將女性符碼化，以女性比喻國族的衰弱。²⁵ 伊瓦－戴維斯（Nira Yuval-Davis）提到女性往往被排除在民族之外，且成為民族國家想像的文化象徵。²⁶ 綜上所述，女性的角色僅僅被視為民族抵抗的文化象徵、文化承載體，亦是民主／國族宏大敘述下的產物；此外，女性主體也在民族的框架下消失。第二層次的討論則是「女人無祖國」的白人女性主義論述。如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在 1938 年出版的《三枚金幣》（the three guineas）²⁷ 提到「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吳爾芙批判父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結盟關係，在國家／父權結合之下，女性被排除在締造戰爭

²² Iris Young,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s Theory," in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Massachusetts: South End Press, 1981), pp. 43-69.

²³ Mina Roces, "Is the Suffragist an American Colonial Construct? Defining 'the Filipino woman' in Colonial Philippines," in *Women's Suffrage in Asia: Gender,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24-58.

²⁴ 蔡雅祺，《論滿州國的婦女動員（1932-1945）》（臺北：國史館，2010），頁 7。

²⁵ 柯惠鈴，「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1900s-1920s）」（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年 1 月），頁 1-12。

²⁶ Nira Yuval-Davis, *Gender and n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7).

²⁷ 參考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著，王葦真譯，《三枚金幣》（臺北：天培，2001）。

的決定過程之外，但當戰事爆發，國家作為一個權力機器卻以民族大義之名，號召婦女支持戰爭。第三層次的討論則是辯證地將女性視為民族解放的主體，因為民族解放／婦女解放是相互纏繞的雙軸線，女性做為性別主體與國家主體會遇見國族與婦運之間的緊密關連。如任佑卿在討論韓國女性主義與國族主義的關係時，認為女性主義不能以超越國族主義為目的，因為女性無法超越民族／國家這一生存的現實基礎。²⁸

陳映真與藍博洲筆下所書寫的左翼理念女性往往是以家務勞動、母職再生產、階級優於性別「獻祭」²⁹於男作家筆下的民族解放與社會主義理念，甚或女性壓迫的議題被化約為階級、民族解放的議題。兩位作家中國民族主義立場的左翼書寫在對抗資本主義的書寫，透露出性別之間的矛盾被視為比階級矛盾、民族解放更為不重要，使得女性主體融入馬克思主義、中國民族主義中卻融化於無形。然而，批判資本主義的發展必須意識到資本主義也是依靠父權文化得以形成，不能將「家庭」獨立於市場外部。若沒有分析家務勞動、性別秩序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直接將女性的壓迫歸於資本主義的階級支配體系或民族尚未解放，那麼不僅忽略基進女性主義在「個人的即是政治的」口號呈現的性別位階，亦忽略女性在家進行勞動再生產的工作是被限定的性別框架。海蒂·哈特曼指出沒有所謂的「純粹資本主義」（pure capitalism）或是「純粹父權社會」（pure patriarchy），因為資本主義與父權文化是互相共生的，若對於資本主義進行純粹的批判，那麼社會只是從封建父權轉型資本主義父權，再轉型到社會主義父權。³⁰同樣的，若沒有看見民族解放路線的社會主義背後的父

²⁸ 任佑卿，〈殖民地女性與民族／國家想像〉，《臺灣社會學研究季刊》第 58 期（2005 年 6 月），頁 4。

²⁹ 楊翠形容陳映真筆下的女性角色往往是一種獻祭於男性理想的角色。本文引用此概念延伸提出陳映真筆下的女性獻祭於社會主義理念。見楊翠，〈獻祭的聖杯——陳映真小說中的女性救贖意象〉，頁 107-133。

³⁰ Heidi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權思維，那麼女性往往成爲民族解放的隱喻以及理念的載體。

性別、階級與革命的衝突、矛盾與辯證，早在許多運動中都可見端倪。安藤丈將提到日本的 1970 年代的新左運動中，女性批判被男性運動者指派去做煮飯和掃廁所等性別分工固定化現象，即可看出性別與左翼運動的衝突。³¹ 又如美國六〇年代的「自由之夏」民權運動中，因夏日計畫前往美國南方進行民權解放運動的學生產生女性主義者與新左派男性之間決裂。³² 上述例子便可見左翼與性別的觀點差異所造成的矛盾與衝突。上述從運動與理論層次上的反思，都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民權運動、女性主義之間的政治分歧。

本文探討陳映真與藍博洲筆下的左翼女性，提出「進步」的女性書寫中，卻依然實踐性別二分秩序下的女性角色，「母性」大過於「女性」的「母性意識形態」，母職實踐、母親身分與家務勞動被美化爲一種社會主義與革命理念的表現；或母親身分成爲烘托革命神聖化的意義；或落入以階級觀點來解釋女性的壓迫等。前文提及將女性主體融入到階級與民族的宏大敘述中，會誤認爲階級與民族壓迫大於性別壓迫，或是階級／民族解放得以性別解放；從陳映真與藍博洲的作品亦看見將左翼女性的系譜與政治啓蒙建立在男性理想主義者身上。上述敘述方式使得社會主義立場忽視性別權力，成爲海蒂·哈特曼所形容的社會主義父權形式，亦或女性成爲民族革命的載體。

四、政治主體與意識啓蒙：「自上而下」的菁英啓蒙或是「自下而上」的政治覺醒

前文提及目前論述多將陳映真與藍博洲定位爲具有民族解放路線社會主義理念的左翼作家，本文追問若將陳映真與藍博洲定位在馬

(Massachusetts: South End Press, 1981), pp. 1-42.

³¹ 安藤丈將著，林彥瑜譯，《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六〇年代的思想之路》（新北：左岸文化，2018），頁 211-293。

³² 道格·麥亞當（Doug McAdam）著，黃克先譯，《自由之夏》（臺北：群學，2011），頁 251-252。

克思主義的書寫光譜上，那麼勢必追問其左翼思想的內涵為何？然而社會主義的實質內涵又為何？其書寫左翼女性的形象呈現怎樣的性別與社會主義思維？才能進一步探究為何兩人社會主義式觀點，卻落入一場「不快樂的婚姻」當中。

若要探究社會主義思維與內涵，那麼必須回到馬克思主義核心概念來比照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哈爾·卓普(Hal Draper, 1914-1990)以歷史性的爬梳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應是「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from Below)。哈爾·卓普的歷史性的研究與推論指出「社會主義」的政治歧義在於過往「社會主義」習慣上分為「改良主義」或「革命主義」；「和平主義」或「暴力主義」；「民主主義」或「威權主義」等，然而，哈爾·卓普認為社會主義運動和思想，最根本的區別在於「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及「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兩者之間的政治歧異。「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核心概念是，抗爭者以自身的命運作爲歷史舞臺上的主體，並成爲歷史舞臺的行動者，在此前提下，社會主義群眾的自我解放才能實現。正如同馬克思在爲第一國際所寫的宣言中所提及：「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由工人階級自己爭取」，此句話正是馬克思的核心思想。相對的，「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不但包含以「社會主義」之名的共產主義專政，也包含由上而下的菁英主義啓蒙。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模式會讓人們會尋求上層的保護與肯定，而不是讓人們擺脫被保護的需要，而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可以被看作此種解放的延續。³³ 上述論述也正呼應了馬克思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³⁴ 強調著自我意識，認爲工人階級的解放必定是工人階級的行動。那麼本文追問陳映真與藍博洲的書寫是否建立在「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菁英主義呢？

³³ Hal Draper, "The Two Souls of Socialism," *New Politics* 5.1, (Winter 1966), pp.57-84.

³⁴ 卡爾·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引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站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瀏覽時間：2018年8月23日）。

(一) 「自上而下」的政治啓蒙：〈山路〉、〈趙南棟〉、 《臺灣好女人》、《幌馬車之歌》

陳映真在 1965 年翻譯過〈共產黨宣言〉與《社會主義之不安》³⁵，並自述六十年代時，熱衷於找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作品，亦於舊書攤尋得《馬克思、列寧選集》與《共產黨宣言》，懷著又害怕又興奮的心情，把書帶回住所³⁶。對於馬克思的核心概念熟稔的陳映真，是否寫出社會主義精神最重要的是自下而上的社會解放以及從自身經驗而產生的政治主體？陳映真筆下的社會主義者書寫如何一窺陳映真的社會主義思想？1968 年入獄的陳映真，在 1980 年代展開白色恐怖系列的書寫，其社會主義理念往往寄託在小知識份子、勞動者、赤貧者身上，如〈鈴璫花〉中的小學教師高東茂；〈山路〉中的焦碳場工人李國坤；〈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徐慶蘭、曾梅蘭；《春祭》中的徐慶蘭、黃逢開、張添丁等人，皆來自窮苦佃農、工人勞動家庭，進而產生社會改革的意識，呈現的是自下而上、具政治主體的男性行動者，其書寫的左翼男性往往是犧牲者、啓蒙者、革命者的角色。

相對的，〈山路〉中蔡千惠則是受到黃貞柏與李國坤的啓蒙；〈趙南棟〉中葉春美受到慎哲大哥的啓蒙開始閱讀《辯證唯物論之哲學》與高爾基的《母親》，最後啓蒙的兄長最終皆以死告終。³⁷ 吳懷晨指出陳映真在系列小說中架構中總是一位知識青年的導師與愛慕的少女，少女受到政治與知識的啓蒙而捲入政治事件當中。該文點出陳映真書寫架構中的性別框架，但未針對陳映真潛藏的性別意識形態進行批判性的討論。陳映真筆下的左翼女性往往是等待被啓蒙者的被動特質，且是透過母性、妻職來完成民族解放立場的社會主義實踐。倘

³⁵ 林載爵，〈所有人都被幽暗的心靈囚禁——談陳映真的早期小說〉，《陳映真創作 5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9 年 12 月），頁 35-47。

³⁶ 陳映真，〈「馬先生來了」？馬克思《資本論》在臺灣出版的隨想〉，《中國論壇》第 364 期（1991 年 1 月），頁 46-49。

³⁷ 吳懷晨，〈快樂的罪行：陳映真救贖三部曲結構中的罪與聖〉，頁 87-135。

若左翼行動的主體必須如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提到「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且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與義務，並消滅一切的階級統治，且批判經濟及生活的支配，是一切形式奴役的基礎。³⁸ 那麼陳映真筆下的左翼女性，政治意識的產生並非來自於自身受壓迫的處境，而是來自於男性典範的啓蒙，且是建立在浪漫化的愛情上來達到社會主義啓蒙之路。如〈山路〉中的蔡千惠，之所以具備社會主義理想，是來自於「勇敢、無私而正直、磊落的青年」黃貞柏與李國坤的男性典範的啓蒙，並以透過成爲黃貞柏的妻子來實踐其理念，「靜靜地傾聽您高談闊論，走完那一截小小而又彎曲的山路」，堅決地作爲「吃盡人間的苦難而不稍悔的妻子」。³⁹ 也因爲黃貞柏與李國坤而始終沒有放棄讀報的習慣。⁴⁰

不十分懂政治的蔡千惠因爲黃貞柏與李國坤的啓蒙，始終沒有放棄讀報與關注中國的變化，蔡千惠從黃貞柏與李國坤身上繼承中國國族主義立場的左翼理念，且堅信地找到李國坤破敗窮困的家，並照顧其家人及到煤礦坑進行勞動，而夢中在天空飄颻的旗幟象徵著黃貞柏與李國坤，成爲蔡千惠的精神寄託與肯認的力量。無獨有偶，在〈趙南棟〉一文中，政治犯葉春美的政治啓蒙來自於慎哲大哥。少女葉春美因爲慎哲大哥的介紹開始閱讀《辯證唯物論之哲學》、高爾基的《母親》，不但喚醒葉春美的知識與語文求知慾，並促使她下田做活、到煤礦場洗煤渣子。在閱讀《辯證唯物論之哲學》時，往往讀好幾次卻不能理解其中奧義，透過慎哲大哥的通信來理解社會主義思想。⁴¹ 葉春美在愛情與政治上，都受到慎哲大哥的「啓蒙」而「覺醒」。

³⁸ 卡爾·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引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站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ia-chinese-marx-186609.htm>，（瀏覽時間：2018年8月23日）。

³⁹ 陳映真，《山路》（臺北：遠景，1984），〈山路〉，頁36。

⁴⁰ 陳映真，《山路》，頁38-39。

⁴¹ 陳映真，《鈴瑤花》（臺北：洪範，2001），〈趙南棟〉，頁113-115。

被陳映真稱爲「中國民族解放的社會主義者」的藍博洲，其書寫的
白色恐怖女性角色則依然以母親、妻子等「關係性角色」來定位這
些女性。如《幌馬車之歌》雖以「口述證言」的方式進行報導，但敘
述模式也呈現的敘述者藍博洲的觀點，如描述鍾浩東、蔣碧玉、黃素
貞「一起奔赴祖國，投入抗日戰爭的計畫」、返臺重建臺灣、基隆中
學案的過程。書中蔣蘊瑜的開場就是「我是蔣蘊瑜，是鍾浩東的太太。
我的本名是蔣碧玉。蘊瑜和浩東都是抗戰期間，丘念臺先生爲我們取
的名字。」⁴² 蔣碧玉以兩名男性爲自己作歷史定位。蔣碧玉回到臺
灣後爲了鍾浩東的教育志業，也同樣以「蔣渭水的女兒」的名義與教
育處長見面。2000年藍博洲在《聯合文學》書寫一系列白色恐怖女
性政治犯的報導文學，後集結成《臺灣好女人》一書，以傅如芝、高
草、許月里、蔣碧玉、許金玉五位女性的故事勾勒白色恐怖時期女
性政治犯的經驗與理念。林麗君(Sylvia Li-Chun Lin)指出藍博洲的《臺
灣好女人》中，蔣碧玉被再現爲受到兩位男性的政治啓蒙。蔣碧玉涉
入政治，並談到自己時說到自己是「鍾浩東的妻子」與「蔣渭水的女
兒」，藍博洲將蔣碧玉的政治啓蒙與鍾浩東與蔣渭水兩位男性做了連
結。⁴³ 此類的敘述不斷反覆在《臺灣好女人》、《幌馬車之歌》、
《鍾浩東百年紀念專刊》不同文本中互文出現。如藍博洲書寫蔣碧玉
在「知道了和鳴的志願後」，對他民族主義與浪漫革命情懷感到嚮往。
⁴⁴ 在《鍾浩東百年紀念專刊》中，藍博洲敘述「1940年元月，20歲
不到的蔣碧玉，義無反顧地跟隨鍾浩東到大陸，參加抗戰。」⁴⁵ 互
文描述蔣碧玉的追隨者角色。另外，《臺灣好女人》描述遭判「參加
叛亂組織」的傅如芝時，敘述傅如芝的悲劇男主角是陳華，因爲判決
書中陳華「秘密通訊，指導其學習」而使得傅如芝被判處死刑。⁴⁶ 《藤

⁴²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臺北：時報文化，2004），頁25。

⁴³ Sylvia Li-Chun Lin, *Representing Atrocity in Taiw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⁴⁴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臺北：聯合文學，2001），頁156。

⁴⁵ 藍博洲主編，《鍾浩東百年紀念專刊》（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6），頁17。

⁴⁶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頁31。

纏樹》中，書寫白色恐怖受難的林明華與傅雙妹的故事。傅雙妹（小說化名為徐郁妹）身邊重要的進步男性為哥哥徐岩冰以及丈夫林明華，傅雙妹亦以支持林明華與徐岩冰為自身追求。⁴⁷

在〈山路〉、〈趙南棟〉、《幌馬車之歌》、《臺灣好女人》、《藤纏樹》中，皆看見啓蒙者為男性政治受難者；左翼女性則是透過男性政治受難者而展開其政治意識的敘述模式。左翼男作家筆下男性社會主義者與女性社會主義者形成一種主導者與追隨者的關係，男性成為典範的追求；女性是其政治追隨者。此外，左翼女性的政治啓蒙是建立在浪漫化的愛情之上，如蔡千惠以成為「黃貞柏之妻」作為對於理念的肯定；〈趙南棟〉中葉春美對於慎哲大哥送來高爾基的《母親》而熱淚盈眶，慎哲大哥喚醒了少女葉春美對於知識和語文之美的飢餓，而使得兩人互相吸引，⁴⁸《幌馬車之歌》、《臺灣好女人》中的蔣碧玉則義無反顧地跟隨鍾浩東到大陸，參加抗戰，皆是愛情與革命的結合，《藤纏樹》中的傅雙妹則支持林明華與哥哥徐岩冰，少女的愛戀得以圓滿。深受陳映真影響的藍博洲在書寫《藤纏樹》時，以文學虛構與歷史紀實融合的方式進行書寫，而在書寫林明華與傅雙妹的事蹟時，苦無傅雙妹的資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藍博洲以陳映真《山路》的蔡千惠以及自己《幌馬車之歌》中的蔣碧玉為原型塑造了傅雙妹（小說中改名為徐郁妹）。⁴⁹ 雖然藍博洲解釋無意在林明華與傅雙妹身上套上「愛情加上革命」的筆法，但《藤纏樹》中傅雙妹的篇幅甚少，一出場是「少女徐郁妹那露齒微笑著的青春容顏」、⁵⁰ 對林明華（化名為邱明華）的革命行動瞭解與支持，就如同《幌馬車之歌》中的蔣碧玉，⁵¹ 理解林明華的理念、支持他的計畫，並因此感到愛戀心情終於圓滿。在林明華受難後，決心一生守著林明華的骨

⁴⁷ 藍博洲，《藤纏樹》（臺北縣：印刻，2002）。

⁴⁸ 陳映真，《鈴瓊花》，頁114。

⁴⁹ 藍博洲，《藤纏樹》，頁253。

⁵⁰ 藍博洲，《藤纏樹》，頁246。

⁵¹ 藍博洲，《藤纏樹》，頁253。

灰，割豬菜、養豬、認份地生活著，有幾分蔡千惠犧牲奉獻之況味。藍博洲在書寫革命左翼人士時，經常帶著革命伴侶的原型，如許金玉與辜金良、鍾浩東與蔣碧玉、林明華與傅雙妹，呼應著陳映真的黃貞柏與蔡千惠、葉春美與慎哲大哥等典型。藍博洲雖然有意將傅雙妹塑造成蔡千惠與蔣碧玉，然而藍博洲的田野受訪者曾光輝的敘述則戳破這層浪漫的想像，提出受難者的妻子之所以堅持，並非是支持受難者的理念，而是「基於封建道德所規定的對婚約的忠實罷了」⁵²。曾光輝的口述紀錄反而呈現了父權道德下女性毫無選擇的現實處境與婚姻侷限，而非浪漫化女性的犧牲奉獻。

陳映真與藍博洲將自身意識與理念寄託在愛情關係上，文中社會主義與民族革命的理念轉化為愛情，而非來自自身壓迫情境與政治意識覺醒，這正背離了馬克思所言革命主體必須自下而上、來自自身受壓迫經驗而產生的行動。左翼男作家筆下的左翼女性是因為愛情關係而展開理想，然而必須追問的是當父權社會中性別關係是建立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上，那麼如何能將社會主義理念建立在愛情想像上呢？當左翼女性理念與情愛合而為一，若無愛情關係，政治上的啓蒙者與追隨者亦不存在，而追隨者也建立了犧牲者的神聖與崇高，如蔡千惠夢中在天空飄颻的旗幟，期待黃泉之下的一日，能討得黃貞柏與李國坤的讚賞，「幻想著穿著白衣、戴著紅花的自己，站在您和國坤大哥中間，彷彿要一道去接受像神明一般的勤勞者的褒賞」⁵³。最終追隨者必須得到啓蒙者的肯認。葉春美追隨著慎哲大哥、蔡千惠追隨著黃貞柏與李國坤、蔣碧玉追隨鍾浩東、傅雙妹追隨林明華，追隨者如一面鏡子映照出了犧牲者與啓蒙者的神聖與崇高；追隨者也必須獲得犧牲者的肯認其理念才獲得確認，此為陳映真與藍博洲書寫左翼女性時忽視了性別政治的其中一點。

⁵² 藍博洲，《藤纏樹》，頁 254。

⁵³ 陳映真，《山路》，頁 39。

(二) 「自下而上」的政治覺醒、民族解放史觀、左翼女性系譜：從《臺灣好女人》到《春天 — 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

藍博洲在 2017 年出版《春天 — 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此書關於許金玉的口述整理則是延伸自 1996 年完成的《臺灣好女人》⁵⁴ 的〈許金玉〉一節。許金玉戰後因「明知計梅真為匪而不檢舉」、「介紹或吸收同志加入組織之事實」而遭判刑，軍法局以叛亂罪判刑十五年。在關於許金玉的紀錄片《春天 — 許金玉的故事》⁵⁵ 與〈春天 — 許金玉的故事：與女性政治犯對話〉中，許金玉都說明影響她這一生最深的一個人是計梅真。⁵⁶ 許金玉的敘述強調自身受到計梅真的影響，促使人生有了變化，在此可以拉出左翼女性系譜，一個女性啓蒙女性的左翼女性系譜。藍博洲在書寫許金玉時，亦寫出許金玉與計梅真左翼女性的傳承系譜，然而，從《臺灣好女人》與《春天 — 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並置亦看見藍博洲敘述模式的轉變。《春天 — 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更強調許金玉與辜金良兩人的民族解放與階級意識的互文性，在描述許金玉的政治啓蒙時也成為：「許金玉女士總是強調，影響她這一生的兩個老師，除了已經犧牲的江蘇籍的計梅真老師之外，另外一位就是她的先生辜金良了。」⁵⁷

比對《臺灣好女人》與《春天 — 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兩本書雖不同時間出版，但關於許金玉部分的敘述內容大同小異；但整本書敘述模式則是從許金玉的個別故事轉向許金玉、辜金良、藍博洲三者並置互文。敘述模式上，藍博洲的《臺灣好女人》以五位女性的受難故事並置，似乎是以女性作為系譜來書寫許金玉等政治受難者，然

⁵⁴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

⁵⁵ 導演曾文珍在 2000 年到 2001 年拍攝。曾文珍，《春天 — 許金玉的故事》（公共電視，2002）。

⁵⁶ 曾文珍，〈春天 — 許金玉的故事～與女性政治犯對話〉，《婦研縱橫》第 67 期（2003 年 7 月），頁 3。

⁵⁷ 藍博洲，《春天 — 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新北：臺灣人民，2017），頁 19。

而《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則是許金玉、辜金良、藍博洲三者的敘述並置作為書寫策略。一來將許金玉與辜金良並置突顯的革命伴侶的精神；二來強調許金玉與辜金良的中國民族解放理念。《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以兩兩參照、相互補足的方式將許金玉與辜金良定位為反抗敵國侵略的左翼民族運動人士。藍博洲在1995年的時候就有為許金玉與辜金良兩人作傳的意圖，如《臺灣好女人》中提到「一九九五年年底以前，關於辜金良與許金玉夫婦倆的歷史採寫，終於在他們校訂之後初步完稿了。同時，我也取得了許金玉女士的同意，先把她的部分公開發表。至於辜金良先生，仍然抱著一貫謙虛的態度，認為自己不是什麼重要的歷史人物而暫不發表。」⁵⁸可見，藍博洲的思想軸線一開始便企圖將許金玉與辜金良並置，採取不分割兩人的歷史軸線來呈現兩人的意識與革命觀。差別在於《臺灣好女人》採取第一人稱的敘述寫法；相對的，《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則是採取許金玉、辜金良與藍博洲三個主要敘述軸線。

從曾文珍的紀錄片《春天——許金玉的故事》、藍博洲《臺灣好女人》、《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許多資料皆呈現許金玉的政治啓蒙來自於自身經驗、計梅真與辜金良三軸線。許金玉在萬華的汽水工廠當女工時，意識到「女工的工資不高，工作又有危險性」，後在郵電局的國語研習班結識計梅真。許金玉在計梅真強調「自己的權益一定要自己爭取，自己如果不去爭取，是沒有人會替你爭取的。」的價值之下，投入「歸班」運動。⁵⁹許金玉因而提出「關於歸班的問題，我們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來爭取，尤其是本省員工，自己一定要出力來做。」⁶⁰計梅真、許金玉的言論正呼應了馬克斯在為第一國際所寫的宣言中所提及：「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由工人階級自己爭取」的「自下而上」模式。計梅真不僅是許金玉的政治啓蒙，更是行動上

⁵⁸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頁203。

⁵⁹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78-79。

⁶⁰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94。

的指導。在許金玉擔任工會代表期間，「計老師對我的整個人生觀的改變，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的」。⁶¹ 許金玉的自我陳述當中，真正對她造成對大影響的人是計梅真。在《臺灣好女人》與《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中，許金玉陳述政治啓蒙來自於計梅真「是她把我的意識與潛能喚醒起來的。而我，事實上，也不過是讓她喚醒的其中之一而已。」⁶² 許金玉的案例相較於前文所討論的作品，則是呈現一則女性啓蒙女性的左翼女性系譜。

然而，《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的敘述模式則是將許金玉與辜金良共同闡述為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的互相映證。藍博洲的報導文學中，將敘事者（藍博洲）、許金玉、辜金良的訪談並置過程，由敘事者進行政治軸線的串聯與鋪陳，凸顯編寫者的史觀與立場。敘事者藍博洲在詮釋辜金良時，先從資本主義先進列強對封建中國展開侵略、資本主義道路的日本侵略中國、1895年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作為敘述的軸線、資本主義日本帝國鎮壓臺灣民族革命運動、後「為實現臺灣光復，前後有高達五萬多名愛國的臺灣青年冒著生命危險，間關萬里，前回大陸」⁶³。從《臺灣好女人》到《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中，藍博洲皆以許金玉之口強調「我們要能真正得到自由，還是要等到祖國統一的那一天。」企圖將三人陳述並置成民族解放社會主義史觀的證言。在許金玉的訪談陳述往往可以拉出「自下而上」的政治覺醒與左翼女性系譜，但藍博洲的敘述者的模式，則是將許金玉關於女工處境、養女處境、左翼女性系譜的陳述鑲嵌在民族解放的敘述中。

⁶¹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 83。

⁶²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頁 226。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 83-84。

⁶³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 42。

五、「代夫出征」的贖罪者：家族罪愆、社會主義墮落與自責愧疚的母親

前文提及，在階級與民族的宏大敘述中，女性成爲關係性角色成爲民族解放隱喻以及自身經驗疏離的異化。陳映真作品中，女性角色以某人的妻子、某人的母親展開社會主義之路時，如此關係性的角色，亦是僅存「黨性」與「母性」而喪失「女性」，甚至以「母性意識形態」進行奉獻與贖罪。前行研究吳懷晨指出〈山路〉中蔡千惠的兩次懺悔，一次在「爲兄長賣友之罪而懺悔。第二次則是爲自己的資本化懺悔而死」⁶⁴，本文則認爲〈山路〉中的蔡千惠有三層意義上的贖罪，其一是爲二哥出賣革命夥伴而贖罪；其次是微觀自身與集體社會喪失社會主義理念而贖罪；其三是擔任李國木的母職將李國木教育成資本主義的墮落者而贖罪。這三個層次的贖罪蔡千惠都是一個替代他人／替代集體而贖罪的犧牲與奉獻角色。

第一層次的贖罪，首先，蔡千惠爲了贖家族之罪而來到李國坤的家中。因蔡千惠二哥蔡漢廷、李國坤、黃貞柏皆被捕，漢廷自首，導致牽連廣闊的逮捕，後李國坤遭槍決，黃貞柏判終身監禁，蔡千惠自責自己爲一名「卑鄙的背叛者」的妹妹，以贖罪之心，決定冒充李國坤在外結過婚的女子，投身於他家。蔡千惠這一層次的贖罪是爲了「贖回家族的罪愆」，即使身爲贖罪者，也是替代兄長而成爲贖罪者，自己並非贖罪的主體。

蔡千惠的二哥既是政治「受難者」亦是政治「加害者」，蔡千惠身爲加害者與受害者家屬的雙重身分，替代兄長進行贖罪，成爲一種「代夫出征」的贖罪模式。當女性被放置在關係性的角色成爲某人的妻子、某人的母親、某人的家屬等附屬的位置，其角色因爲關係性而

⁶⁴ 吳懷晨，〈快樂的罪行：陳映真救贖三部曲結構中的罪與聖〉，頁 107。

被認定，陳映真筆下的蔡千惠的贖罪與理想性是立基在她的「家屬」身分進行贖罪。蔡千惠自身並非罪惡者而是以贖家族之罪來到李國坤的家，是「代替兄長贖罪」的接班者、替代者的角色。陳映真筆下具有社會主義理念的左翼女性蔡千惠，此一角色的塑造卻強化了女性的關係性角色與家族位置，並以女性照顧工作進行贖罪，來延續左翼的理想，使得左翼女性主體被削弱了一層。

蔡千惠贖罪的第二層意義是對於自身墮落於資本主義以及社會集體遺忘政治受難而進行贖罪，並以最極致的方式「死亡」來進行贖罪。陳映真在 1983 年創作〈山路〉，在其中寄託了中國民族立場的社會主義理想，而 1950 年代正是陳映真口中「一個崇高、驕傲、壯烈、純粹和英雄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猶疑、失敗、悔恨、怯弱和變節的時代。」⁶⁵〈山路〉中的蔡千惠既是一個崇高與犧牲的人物；也是一個失敗與變節的人物，為社會主義犧牲；變節於資本主義社會，最終以死亡來為自身贖罪。蔡千惠的死成為陳映真筆下的政治隱喻，墮落的社會主義者必須以死才能獲得救贖，獲得某種崇高性。蔡千惠死亡的意志，來自於生活舒適、自身墮落的贖罪，以及黃貞柏出獄後，以死作為最大的贖罪。蔡千惠是集體社會的一份子，而三十年來，社會中的人們兀自嫁娶、宴樂，蔡千惠的生活也有了巨大的改善。此種墮落與遺忘，不僅是蔡千惠自身的墮落與遺忘，亦是集體社會的墮落與遺忘，蔡千惠必須死亡才能降低罪惡感達到崇高性。此種心境也與陳映真在 1983 年〈綠島的風聲和鼓聲〉一文相互呼應，其中陳映真寫到「直到我自己坐了政治牢，我和千萬同胞一樣，遺忘了長年囚居的人的存在。三十多年來，我們，你和我，把這些在過去的歷史時代中，為良識所驅迫，對國家漢民族的問題有『不同』主張，並身體力行，而終於被判重刑的人們，完全遺忘了。在他們煎熬的二十年中，我們兀自嫁娶宴樂，卻忽略了在牢牆外、紅塵中和獄中人一起受苦的

⁶⁵ 陳映真，《鈴璫花》，〈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頁 262。

父母、妻兒，讓他們孤單無援地在無助、羞辱、挫折中度過。」⁶⁶ 陳映真對於遺忘政治犯的自責，投射塑造出蔡千惠的自責與贖罪，女性成爲男性國族與社會主義理念的文化象徵。陳映真將此理念寄託在蔡千惠身上，蔡千惠成爲理想主義者的載體，面對「富裕的墮落」其社會主義理念要得以挽救必須以死亡的方式才能展現。

蔡千惠第三層次的贖罪，則是母職失職的贖罪，此一層次亦非自身之罪，而是以母親之職替代如子的李國木贖罪。蔡千惠的母職實踐上，將李國木教育成一位不過問政治、追逐金錢的墮落者。這一層次的蔡千惠之死，是爲自身的母職失職而死。上野千鶴子點出「母性意識型態」中懲罰女性將子女的成長是爲自己的幸福，獻身與犧牲自己。⁶⁷ 在此，陳映真再次將蔡千惠的塑造放置在父權制度的家庭角色當中。所以當蔡千惠不斷地教育和督促李國木「避開政治」、「力求出世」，導致「連自己一手努力扶植奉獻的家庭，都變成是自己腐化的關鍵邊緣、成爲囚禁自己的牢籠」⁶⁸，只能以死贖罪。然而，本文質問，蔡千惠爲何必須以再生產的勞動來實踐其社會主義與民族解放之理念，其次，又爲何當一手奉獻的家庭、下一代的走向必須由蔡千惠扛起？歐崇敬詮釋蔡千惠扮演了「母親、姊姊、大嫂，甚至是一家之主、受難者或是加害者種種的角色」⁶⁹，然而，蔡千惠所扮演的受難者以及加害者並非以自身爲主體的受難者與加害者，而是代替二哥加害者的贖罪的女性以及母職失職的贖罪。

吳懷晨指出蔡千惠的死是「罪的內化」，「蔡千惠的自責、她的罪咎感，並非來自於『外在』或己身作爲」，吳懷晨的研究點出蔡千惠之死的弔詭，該文也指出蔡千惠贖罪的對象是其二哥蔡漢廷，犯罪

⁶⁶ 陳映真，《父親》（臺北：洪範，2004），〈綠島的風聲和浪聲〉，頁19-20。

⁶⁷ 上野千鶴子著，劉靜貞、洪金珠譯，《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臺北：時報文化，1997），頁36。

⁶⁸ 歐崇敬，〈「異鄉的存在」與「物化之虛無」的〈山路〉左翼政治思想〉，頁23-56。

⁶⁹ 同上註，頁45。

的是漢廷而非千惠，⁷⁰ 但該文並沒有從性別視角切入探討其社會主義理念文本呈現的性別政治。本文認為蔡千惠的贖罪是性別秩序下「代夫出征」模式地替代家族贖罪。蔡千惠再生產的過程，卻失職的養出政治冷感、只剩物慾的李國木。自己必須承擔在教育李國木過程中，讓他「避開政治」的後果。蔡千惠是透過照顧李國坤一家以及母職的實踐來實踐她的贖罪與男性作家的理念，最終卻也因為母職實踐背離了理想而以死亡贖罪。針對陳映真的〈山路〉以及前行研究的推論，本文提出的質疑是，當蔡千惠進行再生產的勞動與養育工作後，卻必須以母職身分承擔李國木的養成後的路線，正是強化了女性／母親／照顧職責三者之間的關聯，也使得蔡千惠成為母性大過於女性的主體。喪失社會主義理想與生活模式的李國木，由蔡千惠自責承擔，這也說明陳映真在書寫〈山路〉時，未脫離女性依然承擔再生產的職責。其次，蔡千惠的死亡也成為背離理想的象徵，走向資本主義式的生活勢必是一種理念上的死亡。歐崇敬提到蔡千惠是以「保護孩子的母性光輝」卻將自己推向資本主義文化邏輯。⁷¹ 母性的光輝本身應該被解構，因為其並非女性展現自我理念的方式，但母性卻成為陳映真筆下的女性既實踐又背離社會主義理念的方式。

歐崇敬的論文指出蔡千惠「最後竟要透過告解的方式，來要求革命者對她救贖」⁷²，黃貞柏與李國坤因為刑罰與死亡的苦難，而保留了理想性，然而「獄外之囚」的蔡千惠，其獄外的苦難卻沒有因此得到救贖與理想性的保存，陳映真賦予蔡千惠墮落的象徵，構成了男性是受難者、理想性的保持者、被告解對象；蔡千惠則是獄外之囚、墮落的社會主義者、贖罪與告解者，而「獄外之囚」蔡千惠代替兄長、教養無方的母職替代其子（李國木）、代替社會的集體遺忘與墮落而贖罪。

⁷⁰ 吳懷晨，〈快樂的罪行：陳映真救贖三部曲結構中的罪與聖〉，頁 107。

⁷¹ 歐崇敬，〈「異鄉的存在」與「物化之虛無」的〈山路〉左翼政治思想〉，頁 23-56。

⁷² 歐崇敬，〈「異鄉的存在」與「物化之虛無」的〈山路〉左翼政治思想〉，頁 47。

六、「母親革命家」的勞動、繼承、神聖與矛盾

陳映真與藍博洲書寫的左翼女性，亦常出現母親革命家的典型。如蔡千惠以「家」作為革命實踐；蔣碧玉、黃素貞革命露路上的生育、墮胎與送子；宋蓉萱、葉春美的母親身分之繼承等，呈現出「母親」身分一方面是實踐理念的模式；另一方面則是身分的矛盾意義。

（一）母親與照顧勞動：〈山路〉

吳懷晨的研究指出陳映真筆下具有社會主義理念的政治犯總是具有崇高性，這某種程度「美化了政治犯的人格與情操」⁷³，然而，本文認為陳映真美化的不只是政治犯的人格與情操，亦美化了女性追隨者的勞動，此層次的勞動包含兩個層次，其一，底層階級的勞動；其二，女性在私領域中的照顧勞動。前文提及陳映真筆下男性政治犯為典範的追求，左翼女性是其政治追隨者，此種追隨將社會主義與愛情結合形成浪漫化的想像。陳映真的浪漫化也體現在對於貧困與勞動的歌頌，比如蔡千惠來到李國坤家中時，擔任礦坑推煤礦的工人，蔡千惠的「雙頰因為竟日的勞動而泛著粉紅，伊的眼中發散著並不常見、興奮的光芒」⁷⁴，但馬克思對於異化的批判在於其勞動制度的壓迫，重要的在於從此壓迫結構中產生階級意識，而非美化受壓迫位置的勞動、貧困、犧牲與奉獻，然而陳映真歌頌勞動與貧困與家務中的犧牲與奉獻，等於美化了受壓迫的位置。陳映真在其他作品〈我的弟弟康雄〉、〈夜行貨車〉、〈賀大哥〉等也都可見對於勞苦與貧困的歌頌，勞苦者與貧困者成為社會主義理念的象徵，雖然社會主義主體與階級意識勢必從其身處的環境中萌發，但貧困的處境是壓迫結構與權力不對等的結果，當美化勞動卻可能美化受壓迫情境的危機。此外，當女性的勞動神聖性又多了家務勞動的成份，卻也忽略女性家務

⁷³ 吳懷晨，〈快樂的罪行：陳映真救贖三部曲結構中的罪與聖〉，頁 120。

⁷⁴ 陳映真，〈山路〉，頁 81。

勞動是構成女性成爲「第二性」的政治位置，當貧困勞動與家務勞動成爲社會主義理念的展現與隱喻時，有其書寫上浪漫化男性的民族社會主義革命情懷。

前文提及蔡千惠贖罪的三個層次，而三個層次的贖罪皆是透過勞動得以運作。蔡千惠的勞動分爲兩部分，其一是來到李國木的家第三年，補上一個煤礦裡推煤車工人的缺，因而散發勞動者的光芒；其次，來到李國坤家事爲了吃苦以進行贖罪，贖罪的方式則是成爲李國坤的妻子，照顧衰老的父母與年幼的弟弟，其家務的勞動成爲救贖的方式。若回歸到馬克思來思考勞動的意義，馬克思在〈憲章派〉中討論勞動時，提到工人的處境中工人「沒有任何獨立的營生」，其「勞動是市場買賣的對象」，且在「最廉價的市場上被購買」⁷⁵，意味著工人不是自己勞動的主人，無法掌握勞動過程與生產條件，其勞動過程與結果，皆並不屬於他自身，此部分內容爲對於階級處境的批判與自覺。馬克思認爲解構異化的處境必須讓人成爲「充分獲得發展的個人」⁷⁶。反思女性在再生產的勞動中，擔任家務勞動、養兒育女並非自身勞動的主人，這便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所提及的女性與自身的身體、生產、家務勞動中異化。上野千鶴子提到當家務勞動是「以愛爲名義的勞動」，便是以「愛」與「母性」爲名獲得女性的勞動。⁷⁷ 再次看到男作家筆下女性主體與左翼理念之間的矛盾。

海蒂·哈特曼將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結合形容爲一場「不快樂的婚姻」，巧合的是，陳映真的〈山路〉中也以一場「不快樂的婚姻」讓蔡千惠實踐她的社會主義理念，這一場婚姻也勢必「不快樂」，才能從犧牲與奉獻、「從吃盡人間苦難」中獲得救贖與維持理念。然

⁷⁵ 卡爾·馬克思，〈憲章派〉，引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ia-chinese-marx-18520802a.htm>，（瀏覽時間：2018年8月23日）。

⁷⁶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資本論》第1卷（臺北：聯經，2017）。

⁷⁷ 上野千鶴子著，《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頁36。

而，這一場「不快樂的婚姻」正是建立在女性的勞動與再生產勞動上，且從成爲政治啓蒙者黃貞柏之妻到政治受難者李國坤之妻來實踐其理念。蔡千惠理念的實踐，來自於成爲啓蒙者與社會主義者之妻，而後黃貞柏被捕，李國坤受刑之後，蔡千惠來到李國坤的家擔任妻職與母職。〈山路〉中，蔡千惠的社會主義實踐是以家庭作爲實踐場域，以照顧李國坤的父母以及弟弟李國木得以實現，此外，在礦坑的勞動與家務的勞動中的蔡千惠，期待出現空中颺揚的旗幟，得以站在兩人之間受到讚揚，也意味追隨者要得到啓蒙者李國坤、黃貞柏的肯認。

（二）母職之繼承：〈趙南棟〉

相較於〈山路〉中，透過犧牲奉獻與家庭照顧工作來實踐社會主義理想，且以母職實踐社會主義卻又背離了社會主義而以死亡贖罪的蔡千惠，〈趙南棟〉中的葉春美、宋蓉萱則是「母親」來建立具有社會主義理念女性的救贖與崇高形象，並以實踐母職來做爲延續社會主義理想的意識形態。探討家庭「再生產」除了養育、照顧、家務勞動之外，另一個層面則是母職的實踐。陳映真筆下的蔡千惠與葉春美所實踐的母職均非血緣上的母親，如蔡千惠以大嫂的身分卻如同李國木之母；葉春美替代宋蓉萱擔任趙南棟之母，兩者均非血緣上的母親，但以實踐母職照顧政治孤雛來延續逝者的寄託與理念的繼承，並以實踐母職進行救贖與贖罪。陳映真筆下的左翼女性也是以母職身分來展開行動，從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視角上來說，是將性別秩序的框架美化與浪漫化爲一種理念實踐的方式。

除卻蔡千惠此一角色，〈趙南棟〉中雖然創造了宋蓉萱、許月雲兩位主動性高、社會意識強烈、不畏生死的角色，但在塑造宋蓉萱時，依然是以母性來張顯其崇高性。如宋蓉萱在獄中，最愛談起的是小芭樂與老大平平；死刑前投來母親的眼神與托付；「在最難挨的，被人拷問的時候，因爲一心想著肚子裡的嬰兒，常常忘記肉體的痛苦」⁷⁸，

⁷⁸ 陳映真，《鈴鐺花》，頁106。

聚焦在宋蓉萱苦難的母親身分上。此外，因為慎哲的啓蒙而開始閱讀《辯證唯物論之哲學》的葉春美，因為宋大姊在判刑那刻給予她「一個母親最鄭重誠摯的、託付的一瞥」⁷⁹，而繼承了宋蓉萱的母親身分，不停地尋找小芭樂趙南棟，且在宋蓉萱被行刑之後，將自己的鋪位移到她的位置，成為宋蓉萱的替代者擔任起母親的角色看照著小芭樂。後當小芭樂被送出獄之後，葉春美數次透過報告想要得知小芭樂的訊息，卻被以無直系血親被拒絕要求，直到在趙慶雲離世的醫院中，葉春美第一次見到成人的小芭樂趙南棟，「她站在趙南棟的眼前，看著他一頭垢汗的長髮，蒼白而瘦削的臉。她的眼中發散著溫暖的光彩，像是母親看見了自己的骨血。」⁸⁰ 葉春美愉快地想著是宋大姊讓她找到了趙南棟，後將趙南棟帶回石碇仔照顧。葉春美照顧趙南棟，是延續過世的宋大姊的身分，亦是在趙慶雲過世之後，成為接續兩人思想的唯一人選，相較於趙爾平走向資本主義頹喪的生活模式，葉春美是繼承政治受難記憶與理念的人，而陳映真筆下的葉春美是透過成為母親、擔任母親、實踐母職的方式來延續其社會主義理念與政治受難情誼。

（三）「母親革命家」的矛盾與神聖：《幌馬車之歌》、《臺灣好女人》、《藤纏樹》

相對於陳映真過於強調母性，藍博洲在書寫白色恐怖的女性角色時，母親的身分的意義有兩個層面。一方面烘托革命事業的神聖性；一方面則展現了革命與母職的矛盾性。如藍博洲所記錄的蔣碧玉與黃素貞，為了民族解放的革命而墮胎、戰地產子、將孩子送人撫養等過程，此一過程所要烘托的是民族解放與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神聖性，因此蔣碧玉提到：「孩子送走了，我們便把傷心事拋到一邊，背起包袱，勇敢地踏上征途」。⁸¹ 兩人的母親角色，烘托的是貢獻革命事

⁷⁹ 同上註，頁 99。

⁸⁰ 同上註，頁 201。

⁸¹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頁 82-86。

業的神聖性。在民族解放的大業面前，女性的身體、生育、墮胎的困境微不足道，國族成爲優先的宏大敘述。

其次，「母親革命家」的母親與革命家雙重身分往往成爲自我咎責的角色。如蔣碧玉幾次懷孕的過程，在革命過程中爲了革命大業墮胎，才能獻身於革命。後草藥墮胎沒成功，產下次子，卻因病早夭，覺得對不起鍾浩東，決定要好好撫養即將出世的老三，以盡人母之責。《藤纏樹》中，林明華犧牲前的訣別書寫到，希望傅雙妹（徐郁妹）新生的嬰兒可以「像黎明的太陽一樣，把臺灣的天空染成一片火紅」⁸²，女性生育的意義成爲民族解放與社會理念的繼承。然而，徐郁妹卻不幸流產，無聲的飲泣林明華會多麼傷心，感嘆若能爲林明華留下一個孩子那該多好的遺憾。從蔣碧玉作爲女性革命家，到傅雙妹以生殖傳承革命之子的意義，皆看出「母親革命家」，其母親身分與革命家身分產生矛盾性；女性的生殖具有國族與革命繼承之意義，而流產與喪子產生自我咎責，愧對的對象往往是丈夫。

前文提及從女性主體視角思考異化的概念則指出女性在身體、母職上產生異化與疏離，女性的生產、身體與母職實踐無法由自己決定，而是由他人決定即爲女性的異化經驗。⁸³ 蔣碧玉與傅雙妹（徐郁妹）的生產、墮胎、生育、撫養等經驗，則是聽命於革命事業的理想性，女性作爲母體並不存在；母體的意義成爲革命之子的載體。女性身體在民族解放與階級革命的大敘述下，母親身分的捨棄與犧牲，是成就民族解放大敘述的可能；母體的生育則成爲社會主義與民族解放的繼承意義。

⁸² 藍博洲，《藤纏樹》，頁534。

⁸³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七、階級／革命大旗下的女性

陳映真與藍博洲在白色恐怖系列的左翼女性書寫，都可以看到將女性被壓迫的問題至放在階級壓迫與革命的大旗之下。以女性之受苦隱喻理念的犧牲奉獻，亦將女性困境置放為階級尚未解放的困境。如《幌馬車之歌》中書寫蔣碧玉在參與革命過程，進入客家村莊看到客家文化中女性嫁雞隨雞，不能同桌吃飯等問題，欲針對婦女處境想盡一份力。然而，鍾浩東認為婦女問題是經濟問題，因為傳統封建社會女性沒有獨立的經濟能力，所以無法與男性處於平等的地位，將婦女問題置放於社會構造不平等的一環。⁸⁴《臺灣好女人》中來自窮苦家庭的許月里，1925年至1926年的婦女運動將陋習與教育視為婦女受壓迫的根本原因，藍博洲詮釋許月里所參與的「工友協助會所從事的婦女運動，在性質上卻屬於無產階級。它認識到，婦女受壓迫的根本原因是在經濟組織，也就是社會制度；除了與這個制度鬥爭之外，婦女絕不能達到完全解放的目的。」⁸⁵在此，許月里將女性受壓迫處境以階級壓迫等同，認為階級解放就會促進婦女解放。許月里也引用了列寧所說的「沒有無產者的解放便沒有婦人的解放」強化性別解放是置放在階級解放的框架。此處藍博洲的書寫呈現了性別議題置放在經濟的問題下，以階級觀點來理解女性的壓迫，此點無法解釋女性的壓迫處境。不論是將女性視為階級或將階級解放會解決女性壓迫皆是論述上的盲點，性別壓迫確實會出現女性貧窮化的性別階級化的問題，然而階級結構無法取代性別結構進行解釋。

承上述，經濟問題無法解決女性處境的問題，包含無法解釋許月里第二任婚姻中，婚後在外頭搞女人、娶細姨、帶給許月里生活包袱、因為丈夫的債務而坐牢的性別處境；亦無法解釋蔣碧玉在運動過程將

⁸⁴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頁94。

⁸⁵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頁90-91。

孩子送人、必須墮胎等性別與革命的兩難；無法解釋許月里懷著身孕入獄後，被刑求驚恐流產、在監獄中實踐母職的經歷。此外，《臺灣好女人》中，戰爭時期擔任護士的高草與黃怡珍在戰爭逃難的過程，張羅午飯，呈現正是女性的再生產成為女性革命的方式。在性別、階級、民族解放三者的辯證下，階級革命與民族解放經常成為一張大旗，而女性主體則被置放在這張大旗之下。張玉法指出革命論述經常面臨何者為首要議題的問題，民族解放論述經常認為先脫離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的壓迫，就能達到初步的婦女解放。⁸⁶ 游鑑明也指出國族論述經常出現婦女在全民族未達解放之前，是絕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⁸⁷ 將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的壓迫作為敘述軸線的陳映真與藍博洲便式落入此框架，而將女性議題成為階級與民族解放的議題。

八、結論：男作家理想中的「進步」左翼女性

本文探究陳映真與藍博洲刻劃左翼女性的同時，折射出他們自身以對抗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的壓迫社會主義思想與內涵。馬克思指出反抗與階級意識是一種自下而上、具備主體性的意識，然而，陳映真與藍博洲筆下的蔡千惠、葉春美、蔣碧玉、傅雙妹左翼女性呈現了關係性角色、被啓蒙者、追隨者、愛慕者與贖罪者，在政治上被啓蒙；在罪責上替代他人贖罪；在愛情與理念上追隨，不但非從自身的處境自下而上地產生理念與意識，亦產生啓蒙／被啓蒙、追隨／被追隨的上下位階。藍博洲則以陳映真創作的女性展開互文的書寫，並置了蔣碧玉與鍾浩東、許金玉與辜金良、林明華與傅雙妹等伴侶典型。較為特殊的是，許金玉的陳述原本可以拉出一則左翼女性理念傳承的系譜，但後又結尾於藍博洲自身的民族統一革命敘述當中。

⁸⁶ 張玉法，〈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婦女參政權的演變〉，收入《無聲之聲（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42-44。

⁸⁷ 轉引自游鑑明，〈臺灣地區的婦運〉，收入《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416-417。

其次，兩人將女性的政治意識建立在愛情關係上，一來將性別關係浪漫化為革命關係；二來隱喻著男人的革命成為女人的愛情。另外，「母性意識形態」的犧牲成為男性想像女性革命的方式。陳映真與藍博洲筆下具有左翼政治意識的女性以母職實踐、家庭照顧工作來進行社會主義理念的延續，美化性別秩序下的家務勞動與照顧工作，且又將女性置放在私領域當中來實踐社會主義理念，而母性的崇高與母職失誤而以死贖罪；以及將母性與母職神聖化與理想化，一來女性成為關係性角色，二來母親身分是依附革命而產生意義。此種關係性角色如同將左翼女性所形容的是一場「不快樂的婚姻」。

其三，陳映真與藍博洲的作品中並非沒有意識到女性在階級位置中的壓迫，但是將女性的壓迫議題直接納入階級問題來思考，如陳映真華盛頓大樓系列中女工的低薪、貢獻了整個青春時代、卻永遠得不到退休金的處境。⁸⁸ 然而卻沒有賦予左翼女性自主的行動與理念性。難得一見在白色恐怖系列的左翼女性書寫，陳映真使社會主義意識的女性卻成為理念的繼承者、追隨者、替代的贖罪者與家務勞動者。藍博洲則是透過許月里、蔣碧玉的描述，將婦女問題歸因於經濟問題，將婦女受壓迫的原因歸因於經濟組織。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1. 上野千鶴子著，劉靜貞、洪金珠譯，《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臺北：時報文化，1997年。
2. 王文仁，〈從〈幌馬車之歌〉看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創作——兼論臺灣報導文學的幾個文類問題〉，《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3期，2005年6月。

⁸⁸ 陳映真，《萬商帝君》（臺北：洪範，2001），〈雲〉，頁74-75。

3. 卡爾·馬克思 (Karl Marx)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資本論》第 1 卷，臺北：聯經，2017 年。
4. 卡爾·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引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站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ia-chinese-marx-186609.htm>，瀏覽時間：2018 年 8 月 23 日。
5. 卡爾·馬克思，〈憲章派〉，引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站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ia-chinese-marx-18520802a.htm>，瀏覽時間：2018 年 8 月 23 日。
6. 卡爾·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引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站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瀏覽時間：2018 年 8 月 23 日。
7. 任佑卿，〈殖民地女性與民族／國家想像〉，《臺灣社會學研究季刊》第 58 期，2005 年 6 月。
8. 安藤丈將著，林彥瑜譯，《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六〇年代的思想之路》，新北：左岸文化，2018 年。
9. 吳懷晨，〈快樂的罪行：陳映真救贖三部曲結構中的罪與聖〉，《中外文學》第 41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
10. 阮桃園，〈真相的顯與隱 —— 論藍博洲二部有關作家和醫生的報導文學〉，《東海中文學報》第 18 期，2006 年 7 月。
11. 周芬伶，〈迷走《忠孝公園》—— 陳映真近期小說的女性缺位〉，《臺灣文學學報》第 5 期，2004 年 6 月。
12. 林載爵，〈所有人被幽暗的心靈囚禁 —— 談陳映真的早期小說〉，《陳映真創作 5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9 年。
13. 柯惠鈴，「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 (1900s-1920s)」，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年 1 月。

14. 柯惠鈴，〈軼事與敘事：左派婦女回憶錄中的革命展演與生活流動（1920s-1950s）〉，《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15 期，2007 年 12 月。
15. 范宜如，〈邊緣發聲：藍博洲《藤纏樹》的書寫策略及其意涵〉，《人文集刊》第 5 期，2007 年 7 月。
16. 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著，范情譯，〈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不快樂的婚姻：導向更進步的結合〉，《女性主義經典》，臺北：女書文化，2001 年。
17. 張玉法，〈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婦女參政權的演變〉，《無聲之聲（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
18. 陳正芳，〈文化交流下的歷史印記：論陳映真和黃春明小說中的美國人〉，《臺灣文學學報》第 21 期，2012 年 12 月。
19. 陳明成，《陳映真現象：關於陳映真的家族書寫及其國族認同》，臺北：前衛，2013 年。
20. 陳映真，《山路》，臺北：遠景，1984 年。
21. 陳映真，〈「馬先生來了」？馬克思《資本論》在臺灣出版的隨想〉，《中國論壇》第 364 期，1991 年 1 月。
22. 陳映真，《山路》，臺北：洪範，2001 年。
23. 陳映真，《鈴璫花》，臺北：洪範，2001 年。
24. 陳映真，《萬商帝君》，臺北：洪範，2001 年。
25. 陳映真，〈美國帝國主義和臺灣反共撲殺運動〉，《幌馬車之歌》，臺北：時報文化，2004 年。
26. 陳映真，《父親》，臺北：洪範，2004 年。
27. 曾文珍，〈春天——許金玉的故事～與女性政治犯對話〉，《婦研縱橫》第 67 期，2003 年 7 月。
28. 曾靜淪，〈第三世界文學的實踐者——重讀陳映真八〇年代的文學創作與生產〉，《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 11 期，2010 年

9 月。

29. 游鑑明，〈臺灣地區的婦運〉，《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年。
30. 黃淑玲，〈烏托邦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文化，2000 年。
31. 楊翠，〈獻祭的聖杯——陳映真小說中的女性救贖意象〉，《陳映真創作 5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9 年 12 月。
32. 道格·麥亞當 (Doug McAdam) 著，黃克先譯，《自由之夏》，臺北：群學，2011 年。
33. 維吉尼亞·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著，王葳真譯，《三枚金幣》，臺北：天培，2001 年。
34. 趙彥寧，〈階級與自然主義的美學：評藍博洲的《臺灣好女人》與江文瑜的《山地門之女》〉，《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第 61 期，2001 年 12 月。
35. 趙剛，〈重建左翼：重見魯迅、重見陳映真〉，《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7 期，2010 年 3 月。
36. 歐崇敬，〈「異鄉的存在」與「物化之虛無」的〈山路〉左翼政治思想〉，《思與言》第 45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
37. 蔡雅祺，《論滿州國的婦女動員 (1932-1945)》，臺北：國史館，2010 年。
38. 藍博洲，《臺灣好女人》，臺北：聯合文學，2001 年。
39. 藍博洲，《藤纏樹》，臺北縣：印刻，2002 年。
40.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臺北：時報文化，2004 年。
41. 藍博洲主編，《鍾浩東百年紀念專刊》，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6 年。
42.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新北：臺灣人民，2017 年。

43. 羅斯瑪麗·派特南·童 (Rosemarie Putnam Tong) 著，艾曉明譯，
《女性主義思潮導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
44. Hal Draper, “The Two Souls of Socialism,” *New Politics* 5.1,
Winter 1966.
45. Hartmann, Heidi,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Massachusetts: South End Press, 1981.
46. Jaggar, Alison M.,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otowa,
NJ: Rowman & Allanheld, 1983.
47. Lin, Sylvia Li-Chun, *Representing Atrocity in Taiw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48. Roces, Mina, “Is the Suffragist an American Colonial
Construct? Defining ‘the Filipino woman’ in Colonial
Philippines,” in *Women’s Suffrage in Asia: Gender,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2004.
49. Young, Iris,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s Theory,” in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Massachusetts:
South End Press, 1981.
50. Yuval-Davis, Nira, *Gender and n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7.

Left-wing Female Figures under Nationalism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White Horror Series of Chen Ying-Zhen and Lan Bo-Zhou

Li, Shu-Chun*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left-wing female characters who experienced White Terror in Chen Ying-Zhen and Lan Bo-Zhou's writings. Chen Ying-Zhen and Lan Bo-Zhou created left-wing women characters from their imagination and expectation. Willing to play multiple roles, such as mothers, wives and labors, became the ideal images of these women. This paper first argues that the grand narrative of social classes and nations tended to ignore the subjectivities of women. Secondly, the female subject was often integrated into the class issues. The political concerns always take precedence over gender issues. Thirdly, the left-wing females were often enlightened by male elites. Finally, in Chen Ying-Zhen and Lan Bo-Zhou's writings, the maternal spirits became socialism and revolutionary idea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oles of the left-wing women in the writings of the left-wing male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Studie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writers and discusses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national liberation, socialism, and female subjects.

Keywords: Chen Ying-Zhen, Lan Bo-Zhou, White Terror, left-wing

